

● 上海民俗研究

第三集

中国民间文化

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

林文 编

1:6

80502



200249631

中国民间文化

——上海民俗研究

3

1991

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 郑土有
封面设计 俞子龙

中国民间文化(第三集)

——上海民俗研究

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

学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文庙路120号
上海联昌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220,000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7—80510—631—2/I·221

定价：4.20元

编者的话

城市(或称都市)民俗学是民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目前世界民俗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对城市民俗学的研究起步迟、进展缓慢。尽管在1986年就已有学者撰文呼吁加强都市民俗研究,但至今为止尚未有一本研究专著,就连研究论文也不多。这与我国民俗学研究整体发展水平是不相称的,应该引起民俗学家们的足够重视。

城市依据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许多不同的类型,如以形成历史长短而言有古都型、新兴型,以所处地理位置划分有内陆型、沿海型,按城市功能划分可分为政治中心型、商业型。不同的城市类型因其环境(自然的,人文的)的差异,导致其居民的观念、心态、看问题的角度、生活习惯等等的不同,尤其在民俗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如内陆型城市往往比较保守,接受新的东西较缓慢;沿海城市则较开放,容易接受新的思想、观念和习俗。古都型城市往往保留较多的传统,古朴有余而活跃不够;新兴型城市则充满生气,传统束缚较少,但有时也往往丢弃好的传统。政治中心型城市的人思想较敏锐、忧患意识强烈,但往往自命不凡、不易接受外来文化;商业型城市的人具有活跃的经济头脑、思想活跃,但有时人情味不足,唯利是图。每种类型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

本着从基础工作做起的原则,本集《中国民间文化》,我们组织

撰写了一组“上海民俗研究”的论文和调查报告。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典型的新兴的、沿海港口、工商业型的城市，在我国城市中具有代表性。当然本集所收文章，还只是论及上海民俗的几个方面，更多的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推动全国城市民俗学研究的展开，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城市民俗学研究的行列。

目 录

编者的话

上海民俗研究

冲突·并存·交融·创新:

- 上海民俗的形成与特点……………郑土有(1)
- 上海地区最早居民的来源及其习俗……………张明华(24)
- 试析当代上海城乡择偶习俗……………欧 粤(42)
- 从生日观念的变化看今日上海的生日习俗……毕尔刚(56)
- 上海年节文化的独特个性……………顾忠慈(68)
- 旧上海帮会习俗特征……………吴祖德(77)
- 舞蹈的精神升华与退缩
- 宗教习俗对上海民间舞蹈的渗透与反弹 ……蓝 凡(93)
- 上海滑稽的流变及其艺术特色……………金 名(112)
- 论顾绣的历史发展……………梁景惠(123)

吴越文化研究

- 论骨器与河姆渡稻作文化……………陈忠来(130)
- 奉化民间鬼魂信仰与禁忌……………王月曦(145)

灵峰山“葛仙翁菩萨”信仰调查……沈志远 乐炳成(172)

临安山区古树名木信仰……胡月耕(184)

神话研究

鲧禹神话新解

——从原始巫术破译鲧禹神话……顾自力(192)

乱神蚩尤与枫木信仰

——兼论楚辞《国殇》与《招魂》……王孝廉(218)

上海民俗研究

冲突·并存·交融·创新： 上海民俗的形成与特点

郑土有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有着门类齐全的轻、重工业体系，发达的金融业，星罗棋布的商业网络和部门齐全的进出口机构。上海的国民经济收入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重大决定，“浦东开发”成了国家八五期间重要的建设项目。随着上海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上海将以现代化大都市的崭新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民俗是伴随着人类活动的足迹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上海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其中有的促进了上海经济的发展，有的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上海经济的发展。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为了更好地发挥民俗在上海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有必要对上海的民俗作一番研究，分析特点，探讨规律，辨别优劣；同时，上海属于新兴的沿海港口工商业型城市，在我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是我国城市民俗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上海民俗的深入研究，

将有助于我国城市民俗学的建立。鉴于此，本文拟就上海民俗形成的历史、上海民俗构成的要素、上海民俗的特点等问题作一些粗略探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一 上海民俗发展三阶段

上海民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鸦片战争以前。上海虽然建治较晚，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始建上海县，但据考古发现，上海的历史是极为悠久的，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如青浦县城东约5公里的崧泽遗址，下层属马家浜文化，距今 5985 ± 140 年；1979年在青浦的福泉山又发现了马家浜文化的居住遗址；上海县俞塘发现的马桥古遗址，和柘林盐场发现的柘林遗址，均属良渚文化类型，距今 4390 ± 240 年。这些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六千多年前已有古人在上海西部地区生活。此后，原始初民一直在上海这块土地上耕耘劳作，据上海博物馆黄宣佩先生的观点，上海远古时代的历史沿革大致可分为如下阶段：

距今7000年前	上海西部已经成为陆地
距今5900~6300年	属母系氏族公社的马家浜文化
距今4900~5800年	属崧泽文化处于父系氏族公社转变阶段
距今4100~4800年	属父系氏族的良渚文化
公元前11~17世纪	属父系氏族公社的马桥文化 ^①

此后，春秋战国时期，上海属吴国，吴王阖闾(公元前514~494年在位)为防御越国，曾在上海境内筑阖闾城^②。公元前473

^① 参见黄宣佩《上海地区远古历史试探》。

^② 《汉书·地理志》“娄县”注：“有南武城，内邑所起以候越。”《大清一统志》：“南武城在上海县东南六十五里，亦名阖闾城。”

年越灭吴，上海地区属越国。公元前335年楚灭越，上海地区归属于楚。秦代，上海属会稽郡嚠县；汉代，将嚠县改称娄县；三国时上海是孙吴的一个重要军港；南朝梁武帝天监六年（公元507年）改娄县为信义县，梁武帝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将信义县南部分出设昆山县，上海地区属昆山；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将昆山南部、海盐北部、嘉兴东部划出设华亭县，上海属华亭县。直到宋末设上海镇，元代改镇设县。元代上海县面积约五千平方公里，人口约为三十多万人。明、清两朝，上海县面积不断缩小，析出了青浦县、南汇县等，人口约五十万左右。

以上是上海鸦片战争以前的简单历史情况。就民俗而言，这漫长的历史阶段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上海民俗的基质是吴越文化。从文化渊源来看，前述的上海地区的考古发现分属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它们都是吴越文化的源头；从上海的人员构成看，上海原来只是一个小渔村，至元代发展为三十万人的小县城。虽然缺乏其人员来源的原始记载，但可以想象他们大多来自其附近的浙江、江苏，职业以渔民为多。上海话属吴语，与浙江省大部分、江苏省东南部分同属吴语方言区。因此，上海的文化是吴越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上海民俗也就必然要打上吴越文化的烙印。

第二，鸦片战争以前，上海是一个并不十分出名的城镇，在全国的地位也不显赫，发展不快，如元朝建县时三十多万人，经过五百多年，至鸦片战争前只有五十多万人，增长速度缓慢。因为这些原因，这段时间上海民俗的变化不大，基本上保留和延续传统的民俗。如李维清在《上海乡土志》一书中记叙了上海一年四季的节日习俗。

以本邑而论，新年交相贺岁，一日至三日禁扫除室中；花朝剪采赏红；清明扫墓悬纸钱；三四月间妇女多往龙华进香；立夏悬称，食摊糗

酒酿；五月五日，缚艾人、食角黍、插菖蒲，小儿以雄黄抹额、穿黄衣，妇人制五采为健人；六月二十四日，俗称雷神诞，白云观、丹凤楼，也是园等处，进香颇众……七月七日，妇女以凤仙花染指甲。月晦，街衢遍插地香。中秋赏月，炷香斗，食月饼。二十四日，以新米作粉团祀灶。九月九日蒸重阳糕，邀游寺阁，名曰“登高”。十月朔，祀先。腊八日，以枣栗煮粥。年后各以年物馈送，曰“年礼”；以牲醴祭五祀，曰“做年”。除夕，老幼团坐饮膳，为“合家欢”，有达旦不寐者，曰“守岁”。此一岁之大略也。

此书出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写作时间可能要早一些，说明鸦片战争后的最初几年上海民俗仍未发生大的变化。书中所记述的正月初一至初三禁扫地、清明扫墓、五月初五插菖蒲、七月初七乞巧、中秋赏月、九月初九食重阳糕、十月朔祭祖、十二月初八食腊八粥、除夕守岁等都是吴越地区(以至全国)普遍盛行的传统习俗。

因此，我们认为鸦片战争之前，上海的民俗与江苏、浙江的一些小城市基本相同，尚未形成自己的特色。

第二个阶段是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约一百年时间。该阶段是上海耻辱的一百年，上海成了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重要据点，成了冒险家的乐园；该阶段上海民俗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形成了许多新的特点。

特点之一，上海门户开放，人口暴涨，随着人员的五方杂处，大量异地(包括西方和国内其它地区)民俗进入上海。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于1842年在南京与英国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条约共十三款，其中一款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从此，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使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上海因其地理位置较好，更是首当其冲，英、法、美三国相继在上海开辟了租界。同治年间上海知县陈其元在其《庸闲斋笔记》中描

绘了当时的情况：

上海自泰西通商后，环北门外十余里，奏明给洋人居之，洋人岁输其租，谓之租界。租界为英、法、美三国分踞，一切公事归华洋同知暨三国领事会同办理。除盗案外，地方官不复与闻焉。

夷夏揉杂，人众猥多，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居杂处。娼寮妓馆，趁风骈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矣。余摄县事时，欲稍稍裁抑之，而势有不能，尝飭洋租地保密稽之，盖有名数者，计千五百余家，而花烟馆，及卤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与焉^①

由于洋人的“青睐”，上海的名声大振，十里洋场成了冒险家的乐园，而租界是“国中之国”，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在特殊情况下也是百姓的避难所，如太平天国时期、日本侵华期间），导致上海人口急骤膨胀。如前所述，至鸦片战争时上海的人口是五十万，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已达五百多万，^②一百年时间增加了十倍。这增长的四百五十万人除了人口自然增长外，大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涌入上海的，有的做生意，有的进工厂做工人，有的避难逃荒，还有极少数地痞流氓和小偷等。他们进入上海后，把各地的风俗习惯也随之传入了上海，使上海习俗呈现了南腔北调、五彩缤纷的新气象。当然，也包括少量外国人，由于租界的开辟，进驻上海的外国人逐年增加，1846年为一百零八人，1930年接近六万人，1937年为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三人，1945年为十二万二千七百九十五人（其中日本人占六万五千四百零九人，不久遣送回日），1946年减为六万五千四百零九人。^③这些统计数字只是办理过登记手

^① 转引自大同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第553~554页，上海书店1984年1月影印本。

^{②③} 参见《上海地方史资料（一）》第36、38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续的外国人，实际上在上海的外国人，还有不少无国籍和不履行登记手续的流氓、盗匪、逃犯、人口贩子、毒品贩子、走私商人等。他们也把欧美、日本等国家的习俗传入了上海。虽然绝对数而言，外国人的数量很少，但因西方习俗与中国传统习俗相距甚远、差异明显，再加上当时上海滩崇洋思想流行，所以西方习俗影响很大，有许多人仿效。如我国传统婚俗中，新娘要穿大红衣裤、要坐轿子，但在二十年代的上海，租界里出现了新娘子穿白衣白裙上教堂，弃花轿而乘“轿车”的情况。

特点之二，伴随人口的骤增，上海出现了畸型的繁荣，工厂林立、商业网络密布、流氓帮会猖獗、妓院赌场大量出现、同乡会馆陆续成立……所有这些都伴随着新民俗的产生。如工业的发达(既有民族工业也有买办工业)而出现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纺织女工、造船工人、汽车司机……每种不同的工种因生产方式、生产习惯的不同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习俗；商业对民俗的影响更是巨大：服装行业一方面内部拥有自己的行业习俗，另一方面又对人们的衣着习惯起引导的作用，上海的服饰至今闻名全国，领导全国服饰新潮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该阶段产生并形成的格局；饮食业的发展，全国各地著名的菜系如川菜、粤菜、鲁菜、苏菜、扬州菜……和西菜相继进入上海，互相竞争，形成了上海饮食习俗的多样化特征；这段时间上海妓院林立，甚至还有外国妓女：“自同治纪元后，外国妓女亦泛海而来，骚首弄姿，目挑心招，以分华娼缠头之利，于是中外一家。”妓院中有一整套严格的接客、待客、送客规矩，形成了独特的妓院习俗；十里洋场又是流氓恶棍横行霸道的场所，有各种各样的帮会，如青帮、红帮等，旧上海闻人黄金荣、杜月笙等都是帮会的头子。每个帮会都有自己的帮规，如收徒仪式、祖爷师崇拜、处罚规矩、定期祭祀活动、内部语言(切口)、活动方式等等；其它如同乡会馆是在上海的外地人的组织，如宁(波)绍(兴)会馆、潮(州)惠(州)会馆、徽(州)宁

会馆等，其功能是保护在沪同乡的利益，在保持和传播本地民俗方面也起较大的作用。

总之，该阶段由于外地人和外国人的大量涌入，由于上海的急骤发展，各个行业的兴起，使上海的传统民俗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新兴的民俗大量出现，通过冲突、并存、交融、创新的过程，从而形成了上海民俗的独特个性。

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今天。由于社会制度的更变（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成员地位的改变（劳动人民从社会最低层而成为社会主人）、政治制度的更替（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等因素，该阶段上海民俗的演变也是相当快的，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部分传统民俗（主要是陋俗）的快速消亡。旧上海的十里洋场滋生了许多丑陋的习俗，如妓院林立而形成的妓院习俗，地痞流氓组成的帮会中有帮会习俗……解放后，党和政府取缔了妓院，对妓女进行教育和改造，使她们重新过正常人的生活，因此有关妓院中的习俗也就消亡了。镇压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帮会头子，取消了帮会组织，帮会中流行的习俗也就不复存在了。此外同乡会馆也大多自行解散，有关这方面的习俗也就自行消失了。

二是有些传统习俗在逐渐淡化。淡化的原因其一是党和政府自一解放就提倡移风易俗，破四旧立新俗，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其二是上海主要是工商业城市，工人的觉悟普遍较高，对不合理的传统习俗具有较为自觉的抵制意识，同时解放后大多数妇女参加工作，双职工家庭无暇顾及繁琐的传统习俗礼仪；其三是政府为移风易俗工作落实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如龙华和西宝兴路殡仪馆的修建，推广火葬，使传统的丧葬习俗无形之中得到了简化。当然这过程中也有做得过分的地方特别是“文革”期间，如把一切习俗都划入封建迷信的范畴，引起居民的反感和不满。因此，“文革”结束后，有些传统习俗在部分市民中间又悄悄恢复，如清

明节扫墓、正月初五接财神等。

三是出现旧俗的更新和新俗的形成。如传统的春节习俗中，除夕夜全家老少在家中团聚，要吃一顿团圆饭。这种习惯在上海一直流传着，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也未中断。但最近一二年却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今年1月19日的《解放日报》曾以“年夜饭从家庭开始走向饭店”为题报道了这一新动向。其原因主要是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上海人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情趣发生了一些变化，年夜饭讲究享受，而传统的年夜饭需要花几天时间购买原料和烹调，尤其是家庭主妇往往很累，而上饭店不需汰、烧，吃得舒服、快活，虽然花上数百元钱也值得；年夜饭讲究快乐，传统的年夜饭，虽然合家欢聚，享受天伦之乐，但毕竟比较单调，而现在的饭店，往往有舞厅、卡拉OK等多功能娱乐项目，在除夕之夜能增加欢乐的气氛；同时，上海许多大饭店已意识到市民的这种需求，纷纷想出各种花招，以价廉物美、欢乐气氛、吉祥情趣吸引市民。因为这些原因，自1989年始，到饭店吃年夜饭的家庭日趋增多。又如最近几年，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西方人进入上海和上海人出国均很频繁，因此西方的有些习俗也逐渐在上海流传起来，如圣诞节“这个没有‘根’的节日”，却“一年‘热’过一年，上海的圣诞欢庆这几年逐年加温，去年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①类似的情况在婚俗、丧俗、娱乐习俗等方面皆有反映。

二 上海民俗的构成

上海民俗就其来源和构成要素而言是多元的。它以吴越古俗

^① 《一个没有“根”的节日——对“圣诞热”回顾与思考》，见《解放日报》1991年1月16日。

为基质，融汇了中原民俗、湘楚民俗、燕齐民俗以及西方民俗等众多民俗因子，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俗。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上海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形成人员构成的“五方杂处”。因为每个人都有—个“民俗库”，当一个人还在母胎中就已打上居住地祖辈相传的民俗烙印，所以在这些来自各方的客民定居上海后，把其祖地的民俗也随之带入了上海。数百万人迁住上海，每个人都带来了自己的“民俗库”，其复杂程度可想而知。

上海民俗的来源和构成尽管相当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城乡交融，二是中西合璧。

城乡交融指外地习俗传入上海与上海原来习俗结合而产生新习俗的情况，这是上海民俗形成的最重要途径。如前所述上海原来只是一个渔村，元代立县时才三十万人，发展到近代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主要是由于大量外地人的迁入。据1929年至1930年人口统计，当时上海市区人口为一百六十万九千人，江苏籍有一百一十一万六千余人，占总数的66.85%，浙江籍有三十三万四千余人，占总数的20%左右；再加上全国其它地区的迁徙者，可见上海的居民大多来自全国各地。这些外来户，大多按籍贯成立公馆、会所，至清末，这类公馆、公所就至少有三十四个^①，以后又增加了不少。这些外来户最初往往居住相对集中，形成一个个小民俗圈。如胡祥轩《上海小志》卷十“杂记”中说：“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天潼路尽粤人，如在广东……小东门洋行街，多闽人行号，如在福建；南市内外咸瓜街尽甬人商号，如在宁波。”这种情况在今日的上海仍可找到其遗存，如闸北区多苏北人，南市区多宁波人。当然这些小民俗圈不是封闭的，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各地民俗之间、客来民俗与上海本地民俗互相吸

^① 参见《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144~153页。

收，取长补短，逐渐融合。如语言方面，上海人喜欢在称谓前加“阿”字，“阿婆”“阿哥”“阿弟”“阿舅”“阿拉上海人”，这是受宁波称谓习俗影响的结果；饮食方面，上海人所喜吃的月饼和粽子有苏式、广州之分；黄泥螺、蟹粉、鳗鱼、苔条饼及水磨年糕则又是宁波习俗的渗入；名菜“八宝鸭”是上海老饭店店主从苏帮菜鸿运楼偷学来的；又如民间舞蹈中，“闵行区万命伞和南市区龙凤双扇中江南小调与广东音乐的配融，闵行区鲤鱼跳龙门中江苏籍（帮）龙灯和安徽籍（帮）鲤鱼灯的奇妙凑合，都体现了只有在近代上海这种五方杂居的社会大背景下才可能发生的状况。”^①

上海民俗中中西合璧的情况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一是鸦片战争至1949年上海解放，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前者是西方列强用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辟租界让洋人居住，大量的西方商人涌入上海。租界开辟之初，采用华洋分居制度，后因小刀会占据上海，许多人“避难”租界，外商见有利可图，积极建屋，租与华人，以谋厚利，因此租界人员骤增。有一份统计材料记载了当时英美租界1865年（同治四年）至1935年（同治二十四年）间的人口增长情况，现摘要如下（见下页表）^②：这份统计材料虽然不一定准确，但至少可以反映出七十年间租界中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外侨从二千多人发展到近四万人可见增长速度之快。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的入侵和洋人的进驻上海，西方习俗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因为清政府统治的二百多年时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为只要隔绝与外界的关系，就能永保祖宗的基业，而一旦国门被强行叩开，国人面对与传统习俗完全相异的西方习俗，惊奇者有之，模仿者有之，嗤之以鼻者有之。上海是洋人最集中的居住地，西方习俗很快被喜欢趋

① 蓝凡《上海的民间舞蹈活动》，见《民间文艺季刊》1990第2期。

② 引自《上海研究资料》第138～139页，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